

五四与五卅

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，我正在本乡小学里读书，十二岁。但知道有这件事，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，却又在一二年之后了。

我的故乡是这样的一个市镇，它是既开通而又闭塞，不偏僻却是荒寂的。地处于沪杭之间，有铁路线联络这两大都市。它是浙西的两个食米集散地之一；更有不小一个区域的农民的蚕丝，由这里收购了送去上海。所以商业资本很早统治了这个地方，商人久已是它最有权势的人物。读书人，据说在清朝就是如此的，如果他不同时又是典当主人、钱庄老板或大地主之类，一样不为人重视。这里的传统是铜臭压倒书香，文化气息自来稀薄得可怜。

上海市场的消息，几小时内就可以在乡镇的茶馆里引起风波，而北京学生们的“闹事”则连我们“最高学府”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。十余岁的小孩子当然更是茫无所知。

在人口将近三万的市镇里，只有两所完全小学。我所就读的那一所，因为由一位富有的孝廉公当校长，教员中的多数也是地方上有地位的绅士，所以被目为最高学府。孝廉公以他办书院的方式来办“洋学堂”。大堂上供着“大成至圣先师”的神位，受着孩子们晨进夕退的两次敬礼。功课中虽已有了格致、音乐，甚至高年级还教英文，但最注重的还是国文，尤其是《论语》和

《孟子》。我只读过《论语》由一位儒医两通的老秀才给讲解的，教得很认真，要求非常苛刻，甚至连朱夫子的注释都得背。

关闭在这样的门墙里，外面世界发生的思想的激荡，自然不会立即波及的。

然而，要来的终于要来的。大约在一二年后，它由上面和外面侵进来了。

县里的视学员，也是本镇上一个秀才，想夺取这所最高学府。他靠了一个与孝廉公们敌对的大绅士撑腰，又借了点县教育局的势力，推倒了老校长。这一来，颇不得大多数地方人士的同情，因此当他以新校长资格走马到任时，非但旧教员无一留职，而且镇上的所有读书人都给了他抵制，不受他的延聘。结果他只好求才他乡，请了一批杭州第一师范刚毕业的学生来做我们的先生。

杭州第一师范是浙江省里的“北京大学”。在当时，它与长沙的第一师范，可说是北京大学新思想运动在外省的两个最得力的传播站。校长经亨颐，气度与为人都跟蔡元培相似。于学派无成见，对人才兼容。自己的思想是开明而民主的。他所延致的教师中有所谓“四大金刚”（陈望道、刘大白等）学生中出名的是施存统、杨贤江等辈。施存统（后来改名复亮）之出名因为写了《非孝》那篇文章而《非孝》又使第一师范大大出了名。

当时浙江省的统治者（督军卢永祥，省长张载扬，警察厅长夏超）早把第一师范看成为眼中钉。久矣乎要给他一点打击，苦于没有借口。《非孝》（登载在第一师范学生自办的一份刊物上的）一出，便有了题目，当局对学校进行了迫害。经亨颐为了保护他的教员和学生以去就争终于辞职而去。后来学生们为了挽留校长，反对新校长，进行了罢课斗争。最后集体被军警围困

在操场上，坚持了一次全国闻名的大抗争。

我们新校长延聘来的新教员中，有一位就是那次斗争的领袖之一，其余的当然也是新派人物。

其时我是毕业班的学生，我们一班的主任就是那位杭州学生运动的英雄。

不过当那一学期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却以惭愧的心情走进大门的。因为有不少“不事二主”的学生退了学。他们转入旧时三年级主任（一位举人）所办的私塾去就学。留下来的学生大多比较贫寒，他们的家长与学校的旧主持人较少关系或全无关系。

“最高学府”的名誉从此毁了，合镇的上流人都鄙视它。就读该校的学生也不再有什么光彩了。

开学典礼时，不见了“至圣先师”，因此也不再隆重鞠躬。四个新先生，年纪都只比我们大上十几岁的，穿着布大褂，怪不神气。孝廉公时代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派是没有了，我们这些不得已做了“贰臣”的孩子们心里都感觉有点难堪。

看看课程表，“经学”已经不见了，领来了新书，其中竟有用钢笔板自印的白话文讲义。新的校歌也贴出来了，过去校长引以自傲的那首“论文师轼辙，立品继程朱”的歌词，被宣布作废，改填的是些白话字句。孩子们没有说什么，但不少人想起了镇上流行的批评：“这个学校给弄得不成样子了”。

我们是用失望和疑虑心情来迎接这几位五四运动的代表们的。不过事情改变得很快。不出一二个月，我们就非常崇拜我们的新先生了。首先，我们不必像孝廉公时代那样害怕老师，师生之间成了朋友；其次，我们完全懂得他们所教的东西。陈独秀胡适之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文，周作人的小品，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，我们都贪婪地，怀着无上兴趣地读着（顺带说一说，那时老

师们始终没有将鲁迅的东西介绍给我们，甚至我们不曾听过提他的名字。我个人知道鲁迅与阅读他的作品，那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后的事。）尤其叫我们欢喜的，乃是听他们讲自己在杭州闹风潮的故事，讲他们的学生生活。不久，新方式的学生活动就在我们学校里试办起来；成立了自治会，创建图书馆，订阅沪杭日报及杂志，办了手写的粘贴在墙壁上的校刊，甚至还开了一间学校商店。

不消一个学期，“最高学府”的面目和气氛已改得完全不同了，它变成我们小镇上的“北京大学”和“第一师范”。在本地卫道夫子们的心目中，我们都成了陈胡新党的小喽啰，事实上也是如此。

十四岁那年我在小学毕业。为了前途问题，我和那时候的许多孩子一样，和父亲发生了冲突。我的父亲是一个读书人，前清末年进了学的，所以他有资格与士大夫游；但因他不是富家子，地位当然不高，虽在诗酒唱酬中，也不免常要受些闲气。这就养成了他的两重性格：一方面看不起那些似儒实商的绅士；另一方面却决心要在商业上竞胜致富。他时常用了愤世嫉俗的口吻（多半在他醉酒以后）对我和我的兄弟说：“读书人最没有出息，有了钱人家就会敬重你。”因此，当我读完小学之后（当时照我们乡间人的说法，这程度已等于前清的秀才），他坚决要我学生意，不让升学了。他这样决定，另一原因是家境不好，实在也无法供给我上省城读书的费用。所以在我毕业前半年，他老人家就已托人在上海一家洋行里替我说好了练习生的位置。

可是我的想法和志愿与父亲的大不相同。我生来也许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小时候当然更不会看重实际。最欢喜读《水浒传》也欢喜《三国志》。侠客和义士乃是我心灵里最早的偶像。

在家人中 我最崇拜我的叔祖 他是一个武秀才 绰号“大刀”性情真直，虽老不失童心，平生不事生产，以致为家人所贱视。而我却非常欢喜和他在一起，听他讲快人快事，常使我寝食俱废。叔祖爱谈他自己的父亲（即我的曾祖）说他曾经帮“长毛”（太平军）打仗 离家三年 转战皖省，一直到清军攻陷南京后才偷偷回家的。家里长辈谁都不愿意提起这件事，而我也把他想像成了英雄 将他和《水浒》、《三国》中的人物联结起来。

经过一年多五四精神的熏陶，我的兴趣和思想都发生了不少变化。当然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，谈不上什么固定兴趣与系统思想。所谓变，也只是模糊的方向而已。在未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前，我们这些孩子简直没有精神生活的，浑浑噩噩的。拿我个人来说吧，除了演义小说里的人物引起我一些奇异的空想之外，更不会想到比饮食游玩更多的事。而新影响却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打开许多窗，让我们由那里看见许多未曾前见的境界，尝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乐趣，以致引发了对远大事物的憧憬和向往。孩子们的志向与天地扩展得如此之快，竟致远远地超过了父兄们所能了解的程度。我们的小眼再不注视在自家的门楣上，不以一乡一镇中的荣辱为怀。我们（决非我一人如此）同学中不少人都是一样 居然“以天下为己任”将古今中外的科学家、思想家、文艺家为做人的典范了。总之，五四精神使我们变成了染上时代狂疾的小志士，变成了好高骛远的理想家。在我个人，旧日的侠义偶像和新认识的崇高的心智活动家结合起来了，而后者又逐渐地代替着前者。

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，我之无法接受父亲给我安排好的前途，乃是十分自然的。父亲方面呢，他根本不曾想到他的“小东西”自己竟已有了主意。他是我们家中的绝对君主，连他的父

亲即我的祖父在内，都对他非常畏惧的，我当然更加怕他。平时他不苟言笑，对家人从来不和颜悦色地谈句天，只有当他喝醉了而又非泥醉的时候，才透露出一点人情的暖气，卸下了他家长的严肃面具。此时的我，尤其是我的姊姊，才会沾着点父爱：听些并非训斥的牢骚，尝尝他带回来的糕点。

我将到上海去学生意的决定，也就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晚上被通知的。那天晚上父亲特别高兴，记得还从一家宵夜馆里叫了炒面回来。他相当庄重地通知了我这件事情，同时讲述了他如何请托亲友帮忙谋得了这个位置的经过，又说将来补读英文的夜校也托人找好了，他要我好好去做，洋行出路是很大的。父亲的通知原不需要我同意，他说过就算，接着就宣布要吃炒面了而我此时却不知从那里来的勇气，竟敢当面对他说：“我不做生意，我要到杭州去读书。”情势当然急转直下了，在座的母亲和姊姊都吓呆了，拿起了筷子又悄悄地放下，她们以万分惶恐的眼光望着我，我则把眼睛望着地板，不敢看父亲的神情。父亲的决定被人违拗，在这家里大概还是第一次；而这一次竟出于他最小的儿子，一定使他感到十分意外的。所以他的愤怒竟不以惯常的方式发泄出来，没有呵斥，没有敲打，只是气得连声都出不得了。

父子间的关系僵持了两个月，结果却以折中的方式和解了：答允升学，但必须读商科。因此我考进了杭州的省立甲种商业学校。

这个学校与第一师范相连，校舍都是前清的贡院。两校间只有一墙之隔。我是身在墙东而心在墙西。商科的功课引不起我丝毫兴趣，尤其叫我头痛的是簿记、珠算与辨币。这个学校的环境十分庸俗，学生活动全无，文化生活贫乏之极。它比孝廉公

时代的我们的小学还要死气沉沉。呼吸了一年多五四空气的我，简直要在这里窒息了。那时我对学问的兴趣是尚未固定的，择业的问题并不困扰我，我所欢喜的只是一般的学问，一般的知识，特别是新的。所以凡是新书，不管是文学、哲学、科学，我一视同仁地拿来读。无钱买书，星期天就跑到书店里去翻，或到西湖图书馆去借阅。这些书多半是不易懂的，有的是真的艰深，有的则为了天书式的翻译；可是我直着脖子吞下去，不管它们能否消化。在商业学校里混了两年，那枝簿记棍如何使用都不曾学会，而从杜威、罗素、柏格森到泰戈尔，乃至古代学者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等等的大名，却已经知道了一大串，甚至有不少他们的中文译作都被我翻过了。商业和我的兴趣之间也就愈离愈远，再耽下去简直是苦刑了。

在第二年的第二个学期中，学校闹了风潮，我被推为代表之一。结果风潮胜利，学生代表却全被开除。我原是被开除者之一，只因校中的一位国文教员是我父亲的朋友，为我力保，总算“顾全面子”私下教我“自动转学”。这次事情没有使父亲气恼，很乐意地让我转入了一个私立的普通中学，从此我跟商业最后地作别了。

一年后父亲逝世。再过一年，临到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期，“五卅”运动爆发，那时我十八岁。

“五卅”以前的二年中，我仍旧是漫无目标地乱读书。不过由于创造社的影响，兴趣却渐渐转趋于文学方面。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，我成了创造社诸作家的崇拜者，个人则尤其欢喜郁达夫，在有意无意中，深受了他浪漫的颓唐的影响。同时也因为父亲故世，家道日窘的关系，更加以“沉沦”式的不幸青年自命了。同学中也有人欢喜写作的，教员中也有一二个新人物。因

此在“五卅”运动的半年前 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 出版了一张报纸，报名竟莫名其妙地称为《赤报》。其实当时我们的思想离“赤”尚远。内容也根本不属于此一色彩。记得此报的一篇主要文章 是我从一本英文哲学史 只记得是“家庭大学丛书”之一，著者为谁都已忘记了。）上译出来的序言。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固定思想，基本的政治倾向只能说是民族主义。但是报名吓坏了人 所以只出一期 就让校长禁止了。

那时候的杭州，真正的赤色思想原已存在。《向导》报的公开通讯处是杭州法政专科学校。收信人安存真，即该校教员安体诚（一九二七年为蒋介石杀于龙华），是出名的共产党员。我的几个乡前辈在杭州搞国民党（实则共产党）。SY也有了 第一师范里有一点组织，我的自小朋友许志行就是那个组织的负责人。我和他们之间常有来往，但我没有加入。原因是：那时我看不起干政治活动的人。为学问而学问的观念给我的影响很深；我觉得干政治根本不是做学问，两者是背道而驰的，而我则一心要研究学问。我们的中学里也有一两个人了“国民党”，他们很活动 很自负 可是功课很糟糕 这件事又加强了 my 的成见。

其实我那种想法，本质上只是反映了当时新思想运动主流的分化。我是在“五四”之后一两年才接触到五四思想的，等到我追上它、接受它的时候，新思想的本身却早已向前进展，发生变化了。《新青年》分了家 陈独秀与胡适之各走各的 前者前进至马克思主义；后者则仍旧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阶段上。前者由思想而进入行动，由文学革命而政治革命；后者则欲保持思想的“纯洁”反对文人玩弄“龌龊的政治”。由于行动的需要，陈独秀与李达等组织了共产党，与南方的孙中山结了同盟；此时胡适之等却贯彻其“学者作风”与梁任公的研究系合作 同时

寄托希望于北洋军阀的政府。

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此种分合情形，我是茫然无知。杭州虽说是一个省会，北京新出的杂志也多少能够看到，但一般说总是落后得很。那里的多数教员与学生，如果算得上“新人物”的话，多半以新到接受“五四精神”为止。对于“德”、“赛”（民主与科学）二先生的向背，对于孔子的抨击或崇拜，始终还是这个城里新旧人物的分界线。因此在无形中，杭州被五四运动唤起了思想生活的青年们，就当时思想主流的分派说，都属于胡适之方面，亦即属于梁任公方面。他们对于当时为数不多的“国民党分子”虽然不是仇恨的，却是轻视的，因为这些人“不忠实于学问”却去搞政客勾当。

在一九二五年春天以前，我也是这样一个不自觉的“胡适之派”。“五卅”运动却给了我一个激烈的与决定性的转变。

上海爆发惨案的时候，我们正忙于毕业考试。在最初，我们简直不甚留意这件事情的。后来看见它愈演愈烈，学生罢课，商店罢市，工人罢工，掀起了前所未见的大风潮，我们这才开始激动起来，觉得我们也必须有所表示，才能对得起上海同学。学校里的空气热了起来，学生中沸沸扬扬着，校与校间开始了联络，人人都感觉到非干点儿什么不可了。大概是惨案之后的三四天吧，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团到了杭州，向各校学生报告惨案经过；杭州的学生立即行动，由每校推出代表二人，成立杭州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。我因为平时曾参加演讲比赛，而且在校际竞赛会上得过奖，同学们就以为我具备代表资格，推举了我，另一代表便是我上面提过的那个“国民党分子”。应该承认，我最初去当代表是不太愿意的，原因是上述的成见作怪，这些是风头主义者干的玩意儿。在第一次的成立大会上，我意外地又被人推

举成宣传部长 这使我惶恐起来 我心想 糟糕 毕业考试完了，大学也不必想考了。可是这种不愿意与惶恐的心理出现得极其短暂。工作一开始，斗争随着爆发而日趋紧张，我以全心身投进这个新的活动中心，毕业与升学等等都被置诸脑后了。

参加杭州学生会工作大约只有三个月 从六月初起 直到八月底离杭赴京去考大学为止。这一段工作对我的思想与生活却发生了很大影响。简单地说，它使我脱离了胡适之而走向了陈独秀。这三个月间没有读什么书，整天忙的是工作，然所得益，套句现成的话说 真是“胜读十年书”。大时代中炽烈的大斗争，像只巨大的熔炉一样，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适的思想和感情焚化于俄顷之间，同时将你含有的（如果有的话）某些较好的东西提炼出来。一个省会里的学生运动，尤其是当那个时候，无论就深度与广度说，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但因被配置在大时代的背景上，作为全国性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的一部分而出现，其意义亦自不同。对于像我初次跨入思想生活的年轻人，其意义竟是决定性的。我很快懂得了，所谓“为学问而学问”的说法是多么地虚伪；真正学问应该和行动相结合，为行动服务的。我懂得了 做学问与“干政治”决非对立的 而政治上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人们，根本无法做纯粹的学问，他们的学问应该集中于一门，就是如何为改变这个地位而斗争。这点道理一半是我在工作中悟出来，另一半则由于和那些平素为我所鄙视的“风头主义者”的接触和接近，我发现他们中多数不但比我能干，而且比我有学问。我几年来的自以为追求的“真正学问”——乱七八糟地阅读杜威、罗素以至柏格森等辈的大作，这时却被证明出非常无知与混乱的。这时我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，从那两位“搞国民党”的乡前辈手里看到一些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，觉得这是一种切

实而有用的学问，与我先前所学的一些不同。

在杭州的短期工作中，我获得了一个终生受用的认识，那就是：对外斗争与对内斗争不能分开，而且后者胜利乃是前者胜利的条件。记得在学生联合会的第一次大会上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：杭州学生应否与上海同学一致行动，实行罢课？代表们的意见是分裂的。一部分认为这是对外斗争，是反对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，我们不应该罢课，因为罢课这种手段只能用以对内斗争，譬如反对学校当局的黑暗或政府当局的腐败之类。杭州学生罢了课来反对上海租界上的英国人，据这班代表的意见近乎“无的放矢”。人家不会理你们的，荒废学习是你们自己的事”他们说：“为了真正能够反对帝国主义 我们非但不应该罢课 而且应该加紧上课 加紧学业来武装自己”这些人说得颇有道理。另一方面，多半是有了若干政治背景的代表们，则坚决主张罢课。他们的理由很简单：如果不罢课，什么行动都谈不上，一切所谓反对都是空谈。我是主张罢课的。但心里却觉得前一理由充分；赞成罢课，只是为了行动罢了。结果以微小的多数通过罢课。

杭州学生就这样行动起来了。全体学生组成了数百个小队 到戏院、茶馆、公园、以及马路旁边去作鼓动演讲。动员很彻底，连杭州最保守的女校学生都出来了。我们原想让那里的商店都罢市，但没有成功。杭州学运中空前规模的一次示威举行了，参加的约有七八千人，包括小学生和若干市民在内。当时浙江的督军是孙传芳，一个非常狡猾的北洋军阀。在全国热烈的战斗空气中 他不敢正面来压迫我们 他表示“同情”。当游行示威时，他派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兵士来“保护”我们。他还召见了学生代表 发表他“爱国不敢后人”的鬼话 要我们把外交重任信

托给当政的人，安心读书。

我们，至少像我那样的十几岁的孩子们，并非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阴险。可是渐渐地，我们感受到他暗中活动的影响了。有一个学校，仿佛记得是体专，由于那校长与省当局的特殊关系之故，首先对联合会采取了一些古怪的行动。后来，在我就读的那个学校里，一位最热心赞成学生运动的教员被解了职，我这个代表也间接受到警告。不发给毕业证书的威吓都听到了……

在我工作的那三个月中，更露骨的镇压行动虽然不曾见做出来，但是种种的无理阻难，却已足够给了我一个清楚认识，对外斗争与对内斗争是分不开的，真正的反帝斗争只有通过内的革命斗争。

当我交代了学生会工作，离杭赴京的时候，胡适之、梁任公思想已经从我的头脑中彻底廓清，完全站稳了左派陈独秀立场了，虽然在形式上我还不曾加入共产党。

二年大学生活

中学毕业 和小学毕业时候的情形不同 没有人为我规定前途了。父亲已故世一年多，我是充分自由的；但经济条件限制着我，家中境况更不如前。父亲于久病之后逝世，比我仅长六岁的大哥挑起了一家重担。大哥小时候不大爱读书，很早就帮助父亲经商。我家在父亲病中及其死亡前后所遭遇到的种种经济困难，都是这个二十余岁的年轻人去应付了的。在我们那个铜臭熏天的小镇里，他为此自然受够了屈辱，深深体会了人情和世态。他常怀不平，牢骚满腹，立志要中兴我们的家，要为抑郁而死的父亲吐一口气。

我在中学毕业后 大哥赞成我去投考大学 他答应竭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我，希望我能够和他殊途同归，从商学两方面去光大门楣，为亡父争气。

大哥的态度并非丝毫不曾感动我。我虽然不像他一样地直接挑着家庭担子，也很少和他一样地亲自尝到亲友们冷酷的待遇；但我是间接感受了一些的，当然分担着他的感情。我仇视所有在我家苦难中不予援手反加践踏的势利人。特别使我气愤的因而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。其一，父亲卧病那年，我们借住在孝廉公（即小学旧校长）的兄弟的一所房子里。此人原本也是父亲朋友，平时颇有来往，谁知父亲病危，他竟来借故逼迁。另一

件也是我亲眼见到的：父亲刚故世，停柩在堂，从来替父亲经营小工厂的那个本家，却宣布辞职，自己要去开一间同样的工厂了。因为自来对外的一切关系都操在他手里，他这“独立”就无异宣布我们完蛋。大哥气得发抖，我母亲于哀求无效后在灵前痛哭，而这位本家却耀武扬威地走了，我恨不得将他一刀杀死。

这些事在我幼稚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兄弟俩抱着同仇敌愾是十分自然的。中学里我读书相当用功；而在用功的诸般动机之中，显然有“报家仇”一项在内。

中学的毕业班中，连我在内，共有五人要到北京去。临行前，大哥与母亲想尽办法，替我筹措了五十块现洋。那时从我乡到北京的三等火车联票就要将近二十元，所以余下来只有三十元左右了。到北京后的生活怎么办，那时候我简直根本不曾想到。四位同行者由杭州动身，我在中途的火车上会合他们。大哥送我出远门，同坐了一段车。火车上自然不曾说什么话，他只是向我的同伴们致意，要他们多多照拂。车到嘉兴，他落了车，在车窗外嘱咐些十分琐碎的事情。车开了，他伫立在夕阳中，久久注视着探身窗外的我。他那种殷殷期待的眼光唤起了我一种悲壮情绪，仿佛我是以重振家声的战士开上前线去的。

然而，我这个做弟弟的丝毫不曾满足了大哥的期望。时间流去，世事多变，兄弟俩的人生观愈离愈远。在多次失望之后，他对我的手足之情也变得非常冷淡了。

多年的想望终于实现，我考进了北京大学。心情的愉快激动，大概和一个虔诚的教徒走进了有名的圣堂差不多。北大那时已经不是“五四”当年的旧样子了。蔡元培挂冠而去，陈独秀早就离开北京，以全力从事共产党工作，胡适之据说与校中的国民党系教授李石曾、顾孟余等闹意见，告了长假，在上海养病著

书。可是校中还有不少我所崇拜的教授留着，又有那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。号房里出售的各色各样期刊，也引起了莫大兴趣。这里不仅让我看到了一个所谓学府的规模，它的壮丽的形相，而且也让我呼吸到了学问的空气，一种文化的气息，它让我们仿佛捉摸到了民族、时代，乃至世界进展的脉搏。此种崇敬与兴奋的心情，在当时从全国各地远道前来的年轻求知者中，一定是很普遍的。

北京当时的政治情势颇不稳定，在不稳定中急剧地向左倾斜。一次奉直军阀的混战因冯玉祥的“倒戈”而结束；溥仪在紫禁城里的傀儡朝廷给扫去了；因孙中山的死，在古城里造成的政治生活还在激荡，南方相继发生的“五卅惨案”、“沙基惨案”以及使世界震惊的省港大罢工，又使这种生活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不断地提高着，加紧着。段祺瑞的政权是依靠在几个军事势力相持上的一座空架子，它自身全无力量，作恶作善都谈不上，这使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的分合更加自由和顺畅。

以思想论，掌当时实权的各系北洋军阀都是死的。其直属政客们所草拟和发表的“反对赤化”大论，荒谬愚蠢，看了叫人会笑落大牙。他们在青年人中是没有直接支持的。但是间接地，通过了梁任公的研究系和胡适之一班名流，却能在青年中找到对他们的容忍和幻想。梁任公那种要改良不要革命，胡适之关于“好人政府”的胡说，在学生群中并非毫无影响。至于他们那种反对革命的消极的防阻性的战略，所谓“为学问而学问”的口号，对学生的影响当然更大。另一方面是左的，当时是模糊地代表着国民党（实则是共产党）的思想。这个左派的影响比较广大（那是由于全国的斗争形势正处于革命前夜之故），但立场反不及右边明确，思想也没有梁、胡他们的深刻。这现象今天在事后

回想，大概左方大将云集南方是原因之一，而国共关系混淆不清，共产党本身的理论尚未臻充实，也许是另一原因吧。

代表着上述两种倾向的，在我刚到北京时候是晨报和京报，尤其是二报的副刊。此外还有胡适之、陈西滢们的《现代评论》与周作人和鲁迅等人的《语丝》也多少代表两个对立的流派。

这些副刊和期刊都是偏重文艺的，很少讨论到严重的思想问题或政治问题。有时候争论点非常琐碎，譬如进行于鲁迅和陈西滢之间的笔战，牵涉的竟往往是些“私事”。但它们在当时青年中所引起的关心却不下于军国大事。其影响也决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辩论所发生者为小。人们以无限兴趣注意着围绕于文艺与私事的冷战，却在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旧，前进和倒退，非正统和正统，革命和保守。在这方面，凭我的个人经验说，周氏兄弟的作用极大，其功绩不容忽视——虽然在政治思想上，在当时他们固然未曾走到、即使到后来也不曾走到共产主义。

《猛进》周刊 北大教授徐炳昶所编 政治性较浓 左的立场也较为鲜明 但影响不大 销路远不及《语丝》和《现代评论》。另外还有些纯文艺的刊物 如《莽原》之类 不过流量及其思想的影响力都是差得远了。

所有这些刊物，都强力地吸引住了我们这些新来北京的年轻人。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每一期刊物的出版。买到了新刊，总是细心地把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读进去，其用功程度，与读校中功课的情形无法比拟。

我对文艺的爱好那时可说到了极点。不久之后，我居然从这些刊物的读者变成为投稿者了。最初投《现代评论》后来改投《语丝》，看见自己的名字和从来敬佩的作家排在一起，开始自是非常欢喜的。不过这种心情继续得并不长久。为了生活艰

难 我很早就不得不给其他的有稿酬的日报副刊《语丝》与《现代评论》都不给稿费)经常写些东西,因之很快就感觉到了卖文之苦。做文丐的卑屈感 毋须多少时候 就驱散了我做‘作家’的虚荣。

不过没有使我变成作家的更大原因,乃是进校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。紧张的地下革命工作根本不让我有时间去再‘弄’文学 同时生活的巨大转变 随着也改变了兴趣 等到一九二六年寒假之后,我非但极少再写文艺性的东西,甚至连文学的书籍都不阅读了。虽然我选读的始终是大学里的文科。

名义上我读了两年大学;但实际上课的钟点,合计起来不到一整年。真正用功读书的,那恐怕还只是最初的半年,即当我最热衷于文学的那段时间。当时新交的朋友,大多也是爱好此道的。一同赴京的几个老同学,因为并不考进同一大学,来往得反而少了。大学所在地的汉花园和马神庙,大概与巴黎的蒙玛区 差不多吧。这里不单住着北大的学生,而且住着各式各样的青年文化人。他们多数是贫苦的,孜孜向学的,思想与生活却有点放荡不羁的。油头粉面的西装少年此地极少见,常见的是手里捧着厚大的洋装书,或握着新出版的期刊的人,他们多半蓬松头发,身上胡乱套一件蓝布大褂,足下穿着老布鞋或破布鞋。小公寓和小饭馆里,多的是这些操着南腔北调的、形形色式的小名士 小学者 艺术家 或者‘乱党’。多少受过创造社浪漫主义影响的我,原本向往于这种布希米亚生活的,一旦置身实有而近乎想像的环境中,自然非常高兴了。我竭力想和他们接近,不久也结识了其中的一些。杭州第一师范里曾经相当出名的“湖畔

① 巴黎城内学生集中地是拉丁区,不是蒙玛区。——校者注